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Diverse Constructions of Urban Culture

文学想象与城市文化 的多元建构

叶中强 朱 红◎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Diverse Constructions of Urban Culture

文学想象与城市文化 的多元建构

叶中强 朱 红◎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想象与城市文化的多元建构/叶中强,朱红主
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ISBN 978-7-5520-0382-6

I. ①文… II. ①叶… ②朱… III. ①城市文化-研
究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5494 号



文学想象与城市文化的多元建构

主 编: 叶中强 朱 红

责任编辑: 陈如江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长城绘图印刷厂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382-6/C·070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引论 文学与城市:作为精神生活之所在	1
第一章 渊源与传承:典籍、古绘、民俗中的城市记忆	15
第一节 天有历数,地有人据	16
第二节 《清明上河图》与近世城市空间研究的一个面向	22
第三节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及其现代意义	30
第二章 传统与新变:本土文化及其场域的城市化转型	39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白话报刊与城市近代化	40
第二节 近代上海与土的转型	53
第三节 晚清写情小说、“新女性”小说与知识界	69
第四节 “京昆之变”与传统戏曲的城市化	86
第三章 景观与想象:文本、影像与城市形象变迁	105
第一节 上海古代文学中的市镇景观	106
第二节 晚清民国竹枝词中的上海变迁	118
第三节 从画报到电影:“新女性”形象与都市想象	130
第四节 现代绘本与城市印象	143
第五节 城市与文学艺术想象	155
第四章 困境与突围:当代城市语境中的文学与文化生产	163
第一节 都市文学与文化的生产机制	164
第二节 上海文论的先锋性与当代文学历史化走向	181

第三节	“70后”作家的城市叙事与文化认同·····	199
第四节	上海诗歌中的城市意识·····	215
第五章	契机与重建:流动空间、文化消费、创意产业与新媒介实践·····	227
第一节	流动性、城市空间与消费文化·····	228
第二节	高雅文化消费:高票价、消费异化及政策因应·····	239
第三节	文化创意产业、创意社群与当代城市发展·····	256
第四节	媒介转型与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的变迁·····	270
后记	·····	288

文学与城市：作为精神生活之所在

—

作为精神生活之所在，这是文学与城市之间，触及两者根本的一种内在关联。

文学——包括创作、阅读、评论、研究等各种行为——是一种精神生活，这没有什么问题。有必要说明的是，在这里说到的文学，有一部分是广义的“大文学”概念，亦即可以“文学”作为所有门类的艺术的代名词，正如经常用“诗”来指代艺术或所有文学类型，以“诗学”为题的也就是文学理论。虽然不断有人宣判“文学死了”，实际上今天的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结合比以往更为紧密，大量电影、电视剧、动漫都以小说为底本，很多广告是诗人的作品，到处可以看到文学对其他艺术门类乃至对生活的渗透。或者说，文学一直存在于生活之中，就连街头路边的吆喝、田间地头的问答都充满着文学元素——自从有语言文字，有人类文明以来，一直如此。人类需要精神生活。生活需要文学。

问题在于，城市何以是精神生活所在？甚至，作为精神生活空间，乃是城市的根本？按照某种意见，城市是现代物质文明的发源地和汇集地，是钢筋水泥的摩天大厦、高架道路构成的丛林，没日没夜闪烁着令人目眩神迷的广告和霓虹灯，以及冰冷的玻璃反光。它们都让人觉得城市跟精神生活有点格格不入。诸如此类的对于现代城市及城市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构成整个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固然有它的道理。然而，追溯城市发展的历史，在其诞生之初，城市就是人类的精神生活之所在。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里反复强调，城市的胚胎是“人类最早的礼仪性汇聚地点，即各方人口朝觐的目标”；“古代城市的每一处特征都体现出，人生到世界上来的目的无非是为

着赞颂和侍奉他的神明,这就是城市存在的终极原因”。^①当然,城市的这种特性在世界各地有不同表现,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到了近现代,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城市中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变得更丰富、更强烈,充满矛盾冲突。这些现象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关注和研究,促使齐美尔写下《大都市与精神生活》等篇章。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最近一百多年来世界文学、文化和艺术版图中的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潮流,以及受此影响的大众文化,不断抨击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却又大都以城市为阵营,它们的培育和发展都离不开城市。^②——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正是在现代城市里,精神生活更成为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这也是城市引起反思和批判的主要原因。

同样也应该接受反思和批判的是对于精神生活的理解,特别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在此无法充分展开,只能概略陈述一些基本观念:人固然离不开物质生活,但是,把人区分于动物,特别是把各个民族、各个群体区分开来的,更在于获取物质生活的手段、工具,物质生活的材料、形式,以及贯穿在物质生活中的秩序、规则、礼仪、禁忌等,而所有这些都关乎人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价值观。“在人类所有一切不是被迫的,而是出于自愿并且满怀热情进行的物质创造过程中,总会伴随额外的精神活动,尽管这种精神活动在数量上和程度上有时非常有限。”^③完全有理由认为,精神生活绝不只是对物质生活的可有可无的补充和点缀。人类就像需要物质生活一样需要精神生活。在物质生活最大程度缩小差距,就像一些“福利国家”中的状况,或者,在物质生活水准普遍提高的前提之下,人们的生活质量终究将取决于精神生活的质量。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赋予价值和意义,调整物质生活的结构,引导物质生活的方向。

说到这里,也就大致可以了解,为什么要来关注和讨论作为精神生活之所在的文学和城市。在经历三十多年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社会各种问题像一团乱麻,越抽越紧。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反倒比在以往那些艰苦岁月更迫切地呈

①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第80页。

② 只有极个别的例外,譬如离开巴黎、“漂”到塔希提岛的高更,而绝大部分画家选择的是“漂”在纽约或北京等等。另一种例外就是一些作家和艺术家本来就迷恋城市、热衷于描绘城市生活,譬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新感觉派。

③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现在中国人面前:人应该如何生活?或者,人需要什么样的生活?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人给出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答案,但是,它像今天这样经常让人感到困惑,无所适从,却是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混乱到近乎崩溃的结果。尽管也许并没有很多人真正自觉地意识到、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每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在作出自己的选择,以自己的行为在回应这样的问题。无论如何,还是有理由期盼:凭借所有人的共同努力,终将挖掘出已然隐藏在当下、在人们眼皮底下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开启新的生活、新的文化,乃至塑造新的人性,因为“人性将向哪个方向发展,这个问题会成为最终起到决定作用的因素”^①。

当然,本书所面向的是更直接更具体的问题:我们要建构什么样的城市文化?可以从本国尤其是上海本地的城市文化,国外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中吸取什么样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何总结和反思最近二十年来,在全球化格局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如此等等。而作为精神生活之所在的文学和城市,千头万绪,又从何说起?以下就结合本书内容,选取三个或隐或显的关键词来展开,依次是:记忆,实践,想象。它们分别而又同时指向过去、现在和未来。

二

记忆,跟模仿、表现一样,既是基本的,又是非常了不起的精神活动。把活生生的人,有头有尾的事件,以及色声香味触各种感觉,转化成头脑里的印象,在封存一段时间之后重新鲜活起来,还能传递出去,需要经过复杂的“编码”、“解码”之类的加工程序。没有这种似乎与生俱来的、堪称神奇的能力,就不可能有人类的经验、知识的积累和创新,也不可能有人类的精神生活。无论对于民族、国家还是个人而言,记忆都是弥足珍贵的财富,也是无比沉重的包袱。故此有必要强调,精神生活的记忆,不是为了固守过去的程式。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必然需要不断变化,“其命维新”。况且,记忆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像流水一样不断变换形态和方向,像脑细胞一样分裂、衍生。记忆会有选择,也会被抑制、被删改,甚至会让人自欺欺人,也会消亡。记忆的起承转合,促成新的创造。记忆之于精神生活的意义大致如此。

^①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第196页。

文学和城市都是记忆的容器,当然,远不止是容器。

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记忆,一种连带着情感的记忆。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的抒情传统。^①即便是纪实的或虚构的叙事文本,往往也对读者“动之以情”,譬如鲁迅称道《史记》为“无韵之《离骚》”;这种特征传给了戏曲、电影和电视剧,即便是滑稽戏、肥皂剧和“无厘头电影”,常常也在搞笑的间隙里流露款款深情。文学中的情感记忆是个人的,也是普遍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俯仰之间回荡着无数游子的共鸣;它超越了民族、国家甚至语言、文化界限。文学中的情感还会带上伦理、道德和政治的因素,而文学作品在抒写情感之外,还发挥着记录行止、描摹世界、批判现实、传述神话等各种功能。因此,文学记忆是一种整体的、多层面的记忆,七荤八素,五颜六色,它们由情感相互黏合;也因了情感记忆,各种形式、体裁的文学、艺术作品之间息息相通。

城市主要以建筑保存着它的记忆。从豫园到外滩再到人民广场的建筑景观,足以勾连起一部上海史。从某一条街道的建筑,从道路、墙壁和室内室外的装饰,可以挖掘出重叠累积着的数百年沧桑。甚至,一个城市,一个街道、弄堂、学校、工厂以及其他建筑物的名称变换,也传达着政权更迭、社会转折的信息。几乎所有城市都有一些特别的建筑,专门用来保存和维系历史记忆。古代的祠堂、寺庙是人们除了祈愿之外,与天地、神灵和先祖沟通的地方,他们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归属,在这里举行各种仪式,使自己的行为、抉择、约定获得认同、许可或合法性、延续性。现代的博物馆、纪念馆以及更加开放的公共空间,以真实的或复制的陈列和装置,譬如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展出的《清明上河图》长卷,让人们在有限的空间里穿越漫长的时间隧道,身临其境。还有电影院、音乐厅、游乐场、博览会之类的文化空间,在看似只有当下体验的娱乐和游览中,活跃着不计其数的世界历史文化元素。

文学的记忆与城市的记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一种连带情感的记忆,文学总是倾向于探究内心深处细微的褶皱和波纹;即使在百万雄师的大场面中,也会去捕捉一个转瞬即逝的眼神。相比之下,城市更是质感的,触手可及的,就像建筑物外墙那些厚重的石块;城市里的日常生活记忆,离不开外在

^① 所谓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是与西方文学相比较而言的,近年来国内外都有引人瞩目的相关著作出版。但是,有必要说明的是,对于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任何一种说法都可以找到足够的例证和反证。这里也只是举其一端。

于人的实实在在的器具和物品。这两种不同重量、不同力量的记忆相互影响、相互生发。文学给城市设置了一层特殊的氛围,而这种氛围里弥漫着各个城市特有的气质。一座城市的形象常常跟一位作家相连接,反之亦然,譬如鲁迅与绍兴,老舍与北京,张爱玲与上海。不过,放在整个五千年中国文学史或城市史来看,这种关联还是不太普遍,不甚明显。盖因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更多的是时间性的,不太注重空间,即使注意到了,也是笼括天地河山而且人文化了的自然空间,而不甚着意于城市空间环境,故此称得上“城市文学”的作品,如竹枝词,始终只是散落在主流诗文的边缘,点缀着日常生活的闲暇。到了近现代,随着白话文推广、报刊业兴起,以及西方工业社会的物质、技术和文化大量进入,城市文学跟随着声光色电的城市文化一起有所发展,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蔚然成风,但是其成就主要是在电影、画刊、小报等大众文化层面,趣味、技法等各方面都参差不齐。而在当代中国文学最为繁荣兴盛,各种题材、各种流派的作品风起云涌的1980年代,也未曾出现以城市文学为主的热潮。自199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迅速成长,不亚于日益深化市场经济、进入全球化格局之后的GDP和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在此过程中,网络是极其强劲的助推器。与此同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逐渐成为一种惯用模式,国内外资本竞相利用和开发文学资源,用于建造景观公园、开发旅游线路、举办节庆活动、生产影视和动漫作品,等等。但是,不管打着什么名目,资本的目的就是从文学和城市榨取利润,而对两者以及相关的精神生活造成任何损害(有很多是潜在的、很容易让人视而不见的损害)都不以为意,对文学记忆和城市记忆的肆意改写更是不在话下。当此之际,文学和城市皆大有必要在热闹中保持清醒,在开放中执守本分,也更有必要相互支援,维护精神生活的品质。

与所有中国传统文化一样,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城市都具有一种整体性:它们各自构成一个整体,而且,融汇于一个更大的文化整体。尽管古代的城市都是封闭的,以城墙为界,有明显的内外间隔,但是,城市与乡村之间人口流动、物资往来畅通,两边有着大致相似的生活习俗、饮食习惯,城市也与自然浑然一体——这从历代的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可以得到鲜明的感受,而且,直到1950年代,从高处俯瞰整个北京城还是一片浓重的绿色,上海的天际线上也没有多少高楼大厦。最重要的是,城市与乡村遵照同样的空间观念和时间节律,传承同样的经典文本和话语系统,奉行同样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同样,在文本和文字构成的世界里,中国古代文学与其他文本互相杂糅,“文史哲不分

家”，共同构成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文统与政统、道统、学统彼此呼应，任何两者之间都没有什么不可通融的隔阂，从横向和纵向来，都有一个均衡、平稳、持续的意识形态体系。到了近现代，中国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梁启超语），历经整个 20 世纪，到今天仍在转变之中。这个“大变局”，最简单的说法，就是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在世界格局中启动，到现在则越来越是全球化的，或者说，全球化替代了现代化。然而，一方面，全球化浪潮无远弗届，信息网络和商品销售覆盖偏僻农村；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界限和差异有增无减，大小不等的城市内部也以数量不等的城市环线，以及价格不等的住宅小区，形成了层层区隔。60 年来的户籍制度等因素造成了城乡之间在生活习惯、社会交往、价值取向等各个方面的显著差异，双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互相轻视、嘲讽，取笑对方的弱点。近二三十年来，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遍地都在毫不顾惜地拆旧建新，建成不久就推倒重来，以至于有人戏称 CHINA 简直就是“拆哪”。规模空前而又基本上没有什么保护意识的城市建设摧毁了无法计数的历史建筑、文化景观和城市记忆，与之相应的是文化传统的失落、价值观的混乱，等等。总之，由于种种原因，当前在文化上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纵向的断裂、横向的隔阂都非常严重，而且有很多是人为的、不可修复的破坏和毁灭。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对历史记忆的蓄意扭曲、删改、遮掩、抹杀之外，在迅速来临的网络时代或媒体时代，过于泛滥的信息也会冲洗人们的记忆，或者使人变得反应迟钝，对现实漠不关心，或者反应过度。如此断裂、隔阂的文学和城市，都很难具有前面所说的那种整体性和相对独立的传统，从而产生一种凝聚力、让人得到一种归属感。

这样的现实情形对于研究者的要求就是努力从文学和城市中挖掘历史记忆，特别是寻找那些原先被遮蔽的，被边缘化的，而在今天仍然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文化样式，并且，挖掘它们原有的生命力的来源，追索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遭受的困顿，谋求它们在今天重新焕发光彩的契机，并为之营造相应的文化生态，或者，促成它们在今天的环境中脱胎换骨的再现方式。而要真正保存和维护文学和城市的记忆，让它们落土生根、开花结果，就是让它与当下的生活真正发生关系。我们都还记得，2010 年上海世博会提出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也突出了城市建设的最终目标就在于生活。王安忆说：“在我的小说的眼睛里，建筑不再是立体的、坚硬的、刻有各种时代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铭文、体现出科学进步和审美时尚的纪念碑，它变成另一种物质——柔软的、具有弹

性、记忆着个别的具体的经验、壅塞着人和事的细节，这些细节相当缠绵和琐碎，早已和建筑的本义无关，而是关系着生活。”（《空间在时间里流淌》）这不应该仅仅是小说家的变幻点化，也应该落实在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之中。

三

精神生活不是在人们的头脑里完成的，而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完成的——就算是独自冥思默想，也要安顿身体、调整呼吸，更遑论其他。这个道理太简单了，所以容易被忽视。同样被忽视的是：忽视了这一点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精神生活的实践性意味着它的身体性、在场性。多少与此相关，在广义的意识形态层面上，与大众文化关系最密切的两个重要场域就是性别和政治。从性别和政治这两个视角来考察大众文化和精神生活，也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引人瞩目的两大板块，两者有部分重合。20世纪世界各国关于性别和政治的社会运动、理论主张和研究范式层出不穷，表达各自的价值理念和社会诉求，纷纭纠结缠绕。到了20世纪末期，随着世界各国相继从工业社会转型进入后工业社会，社会的重心从生产转移到消费，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行为引起理论界、学术界的关注。消费不仅是经济，也是文化，也是政治。消费也改变了精神生活。尽管一直以来绝大部分精神生活总归免不了有所支出，所以才会“洛阳纸贵”，但是，到了现在，这一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精神生活经常徒有其表，虚浮矫饰，成了消费行为的噱头。由此说开去一点，如同精神生活因消费而变质，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出现了一些类似的问题，要言之，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只选贵的，不选对的”；此外，某些传统民俗、节庆活动也变了味，还有一些“伪民俗”、人造景观等，较之真正需要全身心投入、满怀真情实感在场参与的精神生活，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精神生活的实践性决定了它的多元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体的实践要有主体、对象和环境等诸多具体因素，不可能整齐划一，所以，精神生活和文化建设必然是多元化的。如此简单的常识，还真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因为它曾经被轻视，被践踏，其流风余绪迄今尚未断绝。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另一方面，一味鼓吹放任自流的多元化，又容易褪变为平面化（好像再也没有也不需要有什么高低雅俗之分）、庸俗化（多少文化垃圾就是以多元化的

名义沉渣泛起)。而且,多元化也是自由市场经济得心应手的旗号。自由市场经济能够吸纳各种社会元素,甚至那些本来与之相抵触的力量,为其所用,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服务。在资本引导和支配下的多元化,无非就是消费的多样化,可以让资本借此划分、锁定目标群体,而消费者之为消费者,实际上没有根本的差别,也称不上多元化。总之,文化的多元建构如果没有适当的理论指引和价值导向,缺乏必要的约束和自律,那么,就算是逃脱了权力的藩篱,也免不了落入资本的陷阱。

作为精神生活之所在的文学和城市,都来自人的创造,都因人而存在并获得其意义——称文学和城市为精神生活之“所在”,也是为了强调其实践性。关注、研究文学和城市,其核心和目的也是人的活动,而且是极其多元化的活动,否则,就是架空的。

文学是人学。文学研究就是研究人和人性,而人性不能取决于先验的理论界定,只能实际呈现于人的行为,在所有人的实践经验中确立,发展,逐渐改善——如果确实有可能改善的话。同样,如前所述,这里说到的文学,作为精神生活之所在,不是指可以拿在手里的文本、作品,而更是在于创作、欣赏、评论,以及与之相关的传播、衍生、变异、杂交等所有活动。也就是说,文学不能理解为物质性的存在,而是人的一种特殊的实践。用来盖坛子、生炉子的那一本书,哪怕是《红楼梦》,也不能算是文学作品——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里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此略过不谈。而且,文学艺术这种特殊的实践,跟游戏、仪式、节庆等这些非生产性的活动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它们不像耕田织布那样带来实际的收获,但是它们也都是人的基本需要:“艺术有理由被看作我们本来就想满足的一种生物需要,它的满足会带来惬意和愉快,而否认它就会被认为是生命的一种匮乏。”^①正因为如此,一直以来,文学艺术实践就融合在生活之中,它们原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更加显而易见,城市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城市的一砖一瓦都是人造的,而一座无人的城市很快就会变成草木丛生的废墟,显示出自然生态的修复功能。继列斐伏尔提出“空间是建构性的”之后,大卫·哈维接着说,“城市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空间”^②。城市空间持续不断的重新建构是历史的常

① [美]埃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户晓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9页。

②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态——众所周知，我们经常看到的反复推倒、挖开重来的市政建设完全是另一码事，不妨姑妄言之为历史的变态。城市规划和建设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活动，而且是多样性的活动为本。雅各布森提出的一个普遍原则就是“城市对于一种相互交错、互相关联的多样性的需要”^①。忽视了这一点，就会对很多人的行动造成障碍，并且引发一系列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人的活动改变着城市的空间和建筑，也构成了真正的城市景观。文化研究就是把城市看作一个敞开的、活动着的文本。所谓“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并非仅仅在剧场中观众才会感到演员比其实际身材显得高大。这也是城市所产生的一种特有的幻觉，因为城市中心实际上就是个剧场”^②。刘易斯·芒福德这几句话说的是古代城市的神圣建筑，从人类表演学的视角来看，完全可以普遍适用于现代城市的日常现象：在城市的街道、商店、酒吧和广场上，每个人都是观众，也是演员。

精神生活的实践，文学和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理论研究。理论是现实的精髓。理论研究本身也是重要的实践。民族国家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重塑国家形象，以及国家的文化政策和管理措施都离不开理论研究。也只有通过理论研究，才能确证和梳理文学与城市之间的相互关联，促进双方的互动。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多元建构，特别需要吸收、借鉴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中的理论资源。而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也迫切需要在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形成更具独立性的当代文学传统。

最后，有必要强调，所有的实践活动都落实在主体，极其多元的主体。所谓城市文化的多元建构，关键在于让各种各样的行为主体都能够积极参与城市文化的建构；更具有深度意义的是，从单一主体、统一指导思想下的“百花齐放”，逐渐转变成真正的多元建构。“城市里的多样性，不管是什么样的，都与一个事实有关，即，城市拥有众多人口，人们的兴趣、品位、需求、感觉和偏好五花八门、千姿百态。”^③总之，“多元”也就是“多主体”。当然，也应当看到，参与城市文化多元建构的主体，很有可能面临令人惶惑不安的自我认同问题，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角色和责任，因为这些问题要从原先的一个强大主体的统一安排、解决，转交给个人来担当。吉尔·利波维茨基提出的“促进负责任的个人

① [美]雅各布森：《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 页。这本书的几乎每一页上，都可以看到“多样性”这个词，或者这个意思的其他表达方式。

②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第 76 页。

③ [美]雅各布森：《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第 161 页。

主义的发展”对于他所说的“后责任时代的文明”特别对症、有效,也大体上适用于当代中国社会。^①阿克塞尔·霍耐特探索“分裂的社会应该如何重新整合起来”的问题,他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承认和社会承认,消除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并消除侮辱和蔑视,让人们有尊严地在共同体中生活。^②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分裂恰恰是对于一元化的反抗,而只有在多元化的实践基础上,才能实现重新整合。这是城市文化的多元建构更进一步的意义。

四

想象推动人类进步。迄今为止,人类在科学技术上的每一项成就,无不以梦幻般的奇思妙想为先导。在各个领域,想象都是极其重要的认知和创造能力;归纳和演绎,由此及彼和举一反三,都需要想象力的参与。现代社会很多工作要求按部就班,限制想象力的自由发挥,就会让人感觉枯燥乏味,只好在工作之外寻求补偿。此外,想象也是精神联系的纽带:不仅在于“天涯共此时”的思念,也在于人与世界、先祖、神灵的交流沟通。总之,所有人都在学习、工作或生活中,不同程度发挥各自的想象。

没有想象,文学艺术根本无从谈起。用接受美学的基本观点来说,创作者固然需要文学想象才能创作出“文本”,读者也需要凭借想象,才能在阅读中使“作品”得到最终的完成。这已经是文学理论中的老生常谈。换一个角度来说,文学艺术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激发想象。小孩子们就是在听故事、看绘本之类的过程中慢慢培养他们的想象。这个过程看似初级,但是包含着真正的艺术的奥秘,就连一些炉火纯青的艺术大师也会自觉地重新回到这种初学者的看似乱涂乱画的过程。

想象推动科学技术,反过来,科学技术也开拓出大量想象空间,它们集中呈现于现代城市文化。可以说,正是科学技术的力量,促使城市文化推陈出新,区别于以往的文化形态。在数码技术上发展起来的动漫、网络游戏,以及由此重新焕发生机的电影,还有摄影,能够制作出以前即使想得到也做不到的

^① [法]吉尔·利波维茨基:《责任的落寞——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观》,倪复生、方仁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页。

^② 相关论述参见[德]阿克塞尔·霍耐特:《分裂的社会世界——社会哲学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权力的批判:批判社会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童建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视觉形象，甚至于模糊了真实与虚拟的界限。而这个数码时代也带来了某些弊端：让人以个体为中心的虚拟世界会屏蔽、隔离真实世界，甚至妨碍人们面对面的交流。

事实上，想象干扰现实，凌驾于现实之上，这不是数码时代才产生的问题，而是由来已久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头的一段话到现在也没过时：“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我们要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下呻吟喘息。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①时隔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需要这样的解放和反抗，因为这样的统治仍然存在，只不过在不断改头换面，让人们在这样的统治下还怡然自乐。消费主义之所以在全世界畅行无阻，就连金融危机也拦不住，正是因为如今的消费给消费者带来的并不只是物质上的满足，而是往往伴随着想象中的满足。在资本控制下的媒体和广告以时尚、品位为标榜，诱导消费者，让他们以消费什么样的商品或怎么样消费，作为衡量个人才能和成就、划分社会阶层和地位的外在标准，也以此作为幸福生活的基础，这正是马、恩所说的“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此外，一些电视娱乐节目的成功之道，就是制造一些“真实”的想象来弥合参与者和观众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错位和落差，用虚幻的方式纾解阶层差异和社会矛盾的多重压力。还有，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一些国际大片，一方面充分挖掘和利用各国的历史文化资源，生产出看似跨越国家、民族界限，文化背景模糊不清的人物——确切的说是主角，因为有可能是动物、怪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在全世界获取巨额的票房收入，另一方面，又在积极传播着具有所谓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上述各种情形是在极其成熟、有效的运作手段下产生的，让人们几乎感受不到外在的“统治”和内在的“屈从”，相反，从中获得“主动”的自我意识、自我实现和认同，而且，还能产生相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马、恩满怀激情呼唤的“解放”和“反抗”依然有待持久不懈的努

^① [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页。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揭示这个问题。而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统治和解放，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遮蔽和去蔽，乃是每个人的生存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力,在这方面,罗兰·巴特、德塞都、福柯等一些理论家们作出的贡献特别值得尊重和借鉴,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

在这里有必要说到与上述情形相关的,如今看来几乎毋庸置疑的全球化。作为一种首先在经济领域,然后带动全局,寻求突破、改变现状的途径和范式,“全球化”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了替代“现代化”的一种话语和社会想象。全球化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至少可以从“发现新大陆”的1492年算起,“我们现在所谓的‘全球化’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针对这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发展态势提出,“只有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斗争,才能征服资本在世界舞台上的破坏力量,建设一种替代性的政治经济体系”;然而,在20世纪末,大卫·哈维明确指出,“全球化作为一个过程自从1945年起就一直是美国为中心的。如果没有美国充当整个过程的驱动力和监督人,那它根本就不可能以它所具有的方式发生。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特殊需要……和全球需要之间的某种混淆”。^①在这样的状况下,世界各国都要发展出更有自主性和创造力的全球化想象,以便在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之间应对和解决世界性的危机。——这个看似过于宏大的问题,对于本课题的议题来说并非大而无当,因为全球化的想象实际上就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而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多元建构,也无法脱离全球化的外部环境。

另一个影响着城市文化多元建构的内在因素,就是无限扩张、快速发展的冲动。这种冲动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2012年底的北京重现了1952年的伦敦的雾霾。环境污染可以定量分析,而城市文化所受到的侵蚀则难以估算。“我们的文明正面临着一个高度集中的,超机体的体系的无情延伸和扩张,这个系统缺乏由自治自主的一些单位组成的中心,这些中心能自行选择,进行控制,特别是能自行决定问题并作出反应。这个问题是我们未来城市文化的中心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建设一个更为有机世界,这个世界将能重视所有活的有机物和人类的个性。”^②所谓“超机体的体系”,就像科幻片里那些人类制造出来却无法控制的大怪兽,而所谓“有机的”,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一方面是整体性的,互相关联的,另一方面的含义,则是有限制的、可控制

①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第21页,第66页。

②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第578页。